东盟职教研究简报

2023年第5期（总第22期）

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编制

2023年9月

中心动态

- 2023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首届“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国际合作论坛成功举办.....2
- 牵手“丝路工坊”平台 助推铜仁职教对外开放交流.....5

东盟资讯

- 第20届东博会：促进高水平开放.....7
- 泰国举办“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研讨会.....13
- 中国与东盟共商气象科技合作：探索数字化与智慧化转型.....14
- 缅甸新世纪国际中文学校开展新教师专题培训.....16
- 广西深化与东盟交通物流合作 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7

国别研究

- 以东帝汶为例，中国该如何与小国打交道？.....21
- 对越南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31

热点分析

- “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改变了东盟的什么？.....39

◎中心动态

2023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首届“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国际合作论坛成功举办

8月28日，由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和黎明职业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国际合作论坛在贵阳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执行秘书长刘宝利，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孙善学，老挝教育体育部部长普·西玛拉冯（Phout Simmalavong），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项光亚等领导专家出席论坛。开幕式由黎明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王锋主持。

刘宝利在致辞中指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和中国国际化企业发展相随相伴、互相助力。交流周历来重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研究，愿意继续为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搭建平台，支持双方合作开展“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研发适应本土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标准、资源和装备，共同培养本土化专业化人才。

老挝教育部部长普·西玛拉冯（Phout Simmalavong）在致辞中指出，2023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主题为“教育合作新愿景 ‘一带一路’共繁荣”，非常契合老中两国双边关系和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多边合作关系的良好氛围。为满足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老挝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老挝国家政府和教育体育部加强与中国、东盟等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合作至关重要。老挝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确保人力资源的长期安全保障。首届“中文+职业技能”

教育国际合作论坛，为老中加强教育合作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将为深化老中友谊，提升人文交流合作水平，共同开创和谋划老中职业教育新未来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

项光亚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铜仁职院积极响应国家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倡议，将国际化办学作为提升我院办学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多措并举积极开辟国际合作新渠道，不断对外输出职教智慧，结出了累累硕果。展望未来，我院将继续深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境外合作渠道，积极申办高端项目，做优做特来黔留学教育，做好国际学生“中文+职业技能”培养，持续推进国际专业标准开发项目以及国别与区域研究，推动与东盟各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在主旨报告环节，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孙善学围绕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大势、国际或地区教育互认基本结构和推进职业教育国际互认三个方面对“中文+职业技能”进行了深入阐释。天津职业大学原校长刘斌分别从天津鲁班工坊建设实践、建设效果和鲁班工坊建设联盟工作等方面作了精彩分享；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教授围绕“新法新政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思考”展开深入交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涂端午副教授围绕“把握五位‘四线’推进‘中文+职业技能’高质量发展”对“中文+职业教育”的定位、地位、站位、方位、品味等问题进行了阐述；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惠朝阳围绕“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双线发展、着力提升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影响力”，

对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路径和工作成效进行了分享交流。

在校长访谈环节，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项光亚，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黄华，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樊曜，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贾君，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周燕，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杨林国，黎明职业大学副校长李冬梅，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秦传江，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副院长张克峰，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周晓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蒋平江，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黄金分别围绕论坛主题作精彩分享交流。

访谈交流中，项光亚向与会嘉宾分享了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深入推进“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方面的探索和成果。他表示，铜仁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打造“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高地，不断务实与东盟职业教育多层合作，扎实推动“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并通过构建“三轮递进、四轮驱动、五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学院国际学生人才培养质量高、国际化办学成效显著、国际招生吸引力增强，让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化办学影响力不断提升，为“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贡献了“铜职标准”。

为期一天的论坛层次高端、内涵丰富、成果丰硕，取得了圆满成功。闭幕式上，王锋表示，本次论坛圆满达到了“增进交流、深化合作、创新发展”办会目的，对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职业教育治理和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要切实将今天的会议成果转化为

推动中国-东盟国际化办学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和奋进之力，共同谱写新时代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新篇章，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闭幕式由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海英主持。

本次论坛系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系列活动之一，有关东盟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中外院校代表、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千余人线上线下出席会议，共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计。（来源：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新闻网）

牵手“丝路工坊”平台 助推铜仁职教对外开放交流

为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实，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拓展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新领域，提升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影响力，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组织下，7月12至19日，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海英带领农学院、医学院和外事办等6人参加丝路工坊平台首期“行走丝路”与“赋能丝路”活动，赴尼泊尔、马来西亚2国5城开展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义诊、农业技能培训和物资捐赠等活动。

7月12日，团队与中联部杜小林参赞一行从成都飞抵尼泊尔，当天下午便走进加德满都kavrastsli村为当地农民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围绕农作物的生态种植技术、选种培育及栽培耕作技术等方面的内容给予耐心地指导与问题解答，并在田间指导种植户正确悬挂诱虫板，获得了当地农民的一致点赞。13日-14日，团队在中联部和尼泊尔地方政党及相关协会的组织协作下，前往巴德岗杜巴广场

为当地300余名民众提供免费体检、医疗护理服务，根据个人身体状况与生活习惯给予了细心指导，并向当地民众捐赠2万个诱虫板、300个粮油包。在尼期间，团队还前往尼泊尔Olgapuri Vocational School考察并开展“赋能丝路”活动暨职业教育技术合作对接会，深入探讨职业教育合作交流愿景；在Aloft酒店与尼泊尔当地企业进行洽谈，与3家农业企业签订校企合作框架协议。

7月15日，团队一行从尼泊尔飞抵马来西亚，继续开展“丝路工坊”平台系列活动，在地方政党及马华公会等协会组织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活动顺利开展。7月16日-19日，团队在砂拉越人联党总部、文丹渔村和吉隆坡敦拉萨镇为500余名当地民众进行免费义诊，发放药包1500份、T恤200件。在马期间，团队相继前往砂拉越技术学院、吉隆坡拉曼职技学院、丹绒马林县等地开展交流合作对接会，就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等内容与马来西亚砂拉越技术学院、拉曼职技学院、i-CATS大学、UCSI大学、Carsome Academy、亚太科技大学、TMC学院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与丹绒马林农业局就农业交流合作交换了意见。

本次丝路工坊活动充分体现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责任与担当，铜仁职院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理念，推动了中尼两国民心相通，得到了中国新闻网、新华社，尼泊尔坎蒂普尔报，马来西亚诗华日报等中外20余家媒体争相报道。下一步，学院将持续深耕职教国际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职业教育力量。（来源：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新闻网）

◎东盟资讯

第 20 届东博会：促进高水平开放

9月16日至19日，以“和合共生建家园，命运与共向未来——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打造经济增长中心”为主题的第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简称东博会）在广西南宁隆重举办。

今年是东博会20周年，中国与东盟多国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等高标准出席相关活动。为期4天的盛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政商学界人士汇聚一堂，为中国—东盟合作共谋可持续发展之道，为区域高水平开放共商互利共赢大计。

以更广泛共识凝聚新力量，以高水平开放创造新机遇。如今的东博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下，已经成为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平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沿窗口、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一、凝聚共识，描绘高水平开放新图景

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利益相融、人文相通，是守望相助、风雨同舟的合作伙伴。

从1991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到200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东盟始终坚持以开放合作促进互利共赢，推动双方关系在睦邻友好的道路上持续快速发展，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

开放合作是中国东盟关系的重中之重，更是东博会创立的“初心”和神圣职责。20年来，东博会伴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而成长，也成

为推动双方乃至本区域和全球开放的重要平台，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政要共聚一堂、共谋大计、共襄盛举的经贸盛会。

第 20 届东博会是新冠疫情后首次全面线下举办，中国与东盟国家高规格共办，有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部长和东盟秘书长等在开幕大会现场发表演讲和致辞，并举行双边、多边会见，以及重要纪念活动，各国领导人就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就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对话磋商，凝聚合作共识，增进战略互信，为中国—东盟高水平开放描绘新蓝图。

部长级会议是开放合作落地的重要磋商平台，20 年来，部长级会议已经成为东博会高层论坛的“常态”，每届都举行多个部长级会议，前 19 届东博会共有 182 位中外领导人、3800 多位部长级贵宾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第 20 届东博会举行中国—东盟妇女论坛、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中国—东盟知识产权局长会议、中国—东盟民航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论坛、中国—东盟统计论坛等部长级高层论坛，进一步推动重点领域合作、重大项目落地落实。

除此之外，本届东博会期间还举办山西省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经贸合作交流会、印尼“魅力之城”推介会等 70 多场经贸活动。

“老挝大力支持办好第 20 届东博会，将组织高级别代表团参会。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老挝投资发展，促进老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今年 6 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率老挝代表团在广西访问考察时说。

东博会秘书处秘书长韦朝晖说，本届东博会始终坚持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发挥好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作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为双方关系升级凝聚共识、增强信心、汇聚合力。

二、合作共赢，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朱槿花厅外，象征着“凝聚、绽放、繁荣”的东博会标志绚丽夺目，彩带拼接而成的“10+1>11”的合作公式，寓意盛会跨越界限、链接全球的开放精神。

今年恰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10周年。东博会展馆展出的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展品、一个个项目，集中展示10年来中国与东盟以及“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共享东博机遇的丰硕成果。

本届东博会首批入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共计576件、6.2吨，包括怡保咖啡、榴莲饼、辣椒酱、润肤露等马来西亚特色产品，被精心陈列，陆续摆上展台。

本届东博会，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继续包馆参展，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外国展览面积占30%，东盟展览规模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越南高度重视东博会，越南代表团一直是东盟国家中参会规模最大的国家，前19届东博会越南展位总数超3300个，参展企业超1600家，通过东博会平台，越南的木制家具、农产品、特色食品成功进入中国市场，铃中出口加工区、龙江工业园、深圳—海防经贸合作区等中国对越南投资项目顺利落地。

作为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东博会，越南使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D区8号馆作为越南商品馆展示优势产品，是东盟国家展览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原咖啡、越南奶业、平仙鞋业等越南知名企业已报名参展。越南第20届东博会“魅力之城”山罗省将首次亮相综合展示其旅游优势和商机，更好地推动友好交流。

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总领事杜南忠说，越南期待通过东博会开放平台寻找到更多合作机会，与广西乃至全球各地在经贸、产能、金融、跨境旅游等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自首届东博会举办以来，老挝积极参与，深度融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19届东博会老挝共有828家企业参展，使用展位1870个。老挝啤酒、木制家具、咖啡、大米等优势特色产品借助东博会走进广阔的中国市场，老挝水电站等众多重大投资项目也通过东博会平台成功落地，中老多领域经贸合作不断深入推进。

第20届东博会上，老挝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D区14号馆展示老挝特色优势产品，农产品加工、工艺品、木制品、食品饮料和消费品等行业的55家企业精彩亮相。会期还举办2023老挝—中国贸易投资论坛等重点活动促进投资合作，推介老挝国家投资政策、经济特区等内容，吸引中国及其他东盟国家赴老挝投资兴业。

韦朝晖说，东博会始终坚持共同发展、共享机遇，正朝着打造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先行先试公共产品的目标坚实迈进，双方合作共赢的版图正加速扩大、越来越光明。

三、互惠互利，共谋高水平开放新机遇

走进“壮美广西开放发展展区”，一条塑造中国与东盟的“黄金通道”映入眼帘，这就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它利用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由重庆一路向南，经广西北部湾出海通达世界各地，相较于走长江航道出海转运东盟等地，新通道大幅缩短了运距，出海物流时间最长可压缩 15 天。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中国面向“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开放新的“大动脉”，2019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标志着其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广西是这条通道最便捷的出海口，也是最重要的枢纽之一。

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建立起西部 12 个省区市和海南省、广东省湛江市、湖南省怀化市“13+2”合作机制，通道延伸到越南胡志明市、印尼巨港、菲律宾苏比克等地，目的地辐射到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00 个港口。

新通道“从无到有”，东博会功不可没。从 2004 年首届举办以来，东博会就一直在推动中国—东盟互联互通，不断为双方高水平开放寻找新的突破口、发现新商机，新通道就是很好的例证。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正在广西加快建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江海联运的大运河。建成后，它将衔接“一带一路”江海通达贯通内外，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将为中国—东盟合作创造崭新机遇。

第 20 届东博会首次设置壮美广西开放发展展区，展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特别是平陆运河等重大项目建设。

不仅仅是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在东博会的推动下，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中马“两国双园”等一批项目和机制落地、升级，双方开放正迎来新的高峰。

展示宣介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中越智慧口岸，举办中国—东盟知识产权局长会议、中国—东盟国际标准化论坛……本届东博会不断促进制度型开放，积极服务和促进广西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取得更大突破，服务广西向海而兴、向海图强，与东盟共挽、与大湾区相融，打通广西开放发展的“任督二脉”，服务广西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把独特区位优势更好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

中国与东盟都是全球重要的生产制造基地，拥有超大消费市场，双方密切的经贸往来，事关 11 个国家 20 亿人民的生活福祉。当前，中国连续 13 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已于 2020 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中国和东盟经济依然充满活力，探寻新机遇、开拓新空间、寻找共赢点，正成为本届东博会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双方更高水平的开放、更高质量的发展、更紧密的合作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韦朝晖说。（来源：东盟头条）

泰国举办“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研讨会

中新社曼谷9月7日电（记者 李映民）当地时间7日，由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研讨会在曼谷举办，会议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对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塑造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在研讨会上表示，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蓝图变成现实，为各国带来发展实效和民生实惠，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未来，中国将一如既往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一道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让“一带一路”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

泰国前总理阿披实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亚太地区甚至全球来说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成了区域开放、互联互通的重要推动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各国间的交流互通，提升了人民福祉。泰国应该抓牢“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历史机遇，加速推进中-老-泰高铁泰国段建设，加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说，“一带一路”倡议，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指导思想彻底打破了零和博弈的思维局限，让世界各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联互通，让发展中国家真正参与到了全球治理中。“一带一路”倡议给了亚太国家新的发展思路，“一带一路”倡议十年的亚太实践也成就了亚太命运共同体、泰中命运共同体和老中命运共同体。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布亚当·森卡姆霍特拉冯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老中两国互联互通，老中铁路实实在在地促进了老挝的发展，老中铁路成为老挝从陆锁国成为陆联国走向繁荣发展的道路。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视频发言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让国际社会真正从全球发展层面关注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稳定。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金平认为，“一带一路”推动了柬中两国各领域合作，让柬埔寨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柬埔寨期待与中国携手共赴“一带一路”的下一个十年。

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近 200 位政府、智库、媒体、商界代表出席本次研讨会。（来源：中新社）

中国与东盟共商气象科技合作：探索数字化与智慧化转型

中新网南宁 9 月 16 日电“未来，我们将考虑与部分东盟国家联合开发集成 AI 能力的‘云端早期预警支持系统’和卫星综合应用平台‘风云地球’，共同探索气象业务数字化、智慧化转型。”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 16 日在广西南宁介绍。

当天，第 3 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在南宁开幕，气象科技合作成论坛关注焦点。张祖强在论坛上介绍，过去两年，中国为东盟相关国家免费更换了中国气象局气象卫星数据广播系统，还在广州设立了世界气象中心(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分中心，未来将与香港和澳门气象部门一道，与东盟伙伴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

广西天气与东盟国家天气气候有很多相似之处，气象防灾减灾工

作繁重，气候形势复杂多变，气象灾害多发、重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许显辉在论坛上介绍，“广西愿与各方一道，建立气象灾害的监测及联防机制，完善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合作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灾害损失。”

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主任本·丘吉尔在视频致辞中，肯定了中国促进东盟区域的气象合作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表示，中国务实推进和东盟在天气预报、监测、气象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全面合作，提升了各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提升区域防灾减灾水平。

中国气象局东盟大气探测合作研究中心已落户广西，广西气象局作为“一带一路”风云卫星应用示范中国六个试点单位之一，建成了东盟地区大气污染遥感监测系统，进一步拓展区域气象合作。

许显辉建议，中国和东盟应共同推动气象科技创新。“广西愿与各方一道，集聚各方优势科技资源，深入拓展极端灾害性天气监测与联防、气象装备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开展高水平、多层次的气象科技研发合作和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应用，不断提升中国和东盟国家气象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

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教育部、北京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在会上联合启动了“一带一路”气象访问学者计划，支持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气象灾害预警、数值预报、气候预测、卫星应用等领域开展联合研发，共同培养高级气象业务和管理人才。（来源：中新网）

缅甸新世纪国际中文学校开展新教师专题培训

近日，缅甸新世纪（CPEC）国际中文学校曼德勒、腊戍、仰光三校区，对新入职的 22 位中方教师开展了入职前的专题培训。

本次培训从 9 月 2 日至 10 日，分为校长主题培训、教学管理培训、导育管理培训三个方面。

新世纪校长张继为新老师做了六个板块的主题培训。在《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主题培训中，张校长从缅甸浓郁的佛教文化、纯净的人文社会、深厚曲折的华文教育历史，以及新世纪新型华文教育的诞生背景、艰难的发展历程、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等方面，向老师们讲述了华文教育的历史使命和社会需求，以及新世纪“传播中华文化、服务缅华社会、增进缅中友好”的办学宗旨目标。请老师们来到这里，放心，安心，静心，专心，明白做华文教育的意义和使命，要求老师们“务实守道”、“安居乐教”，无愧炎黄子孙，无愧中方教师形象。

在《人在天地间，难如远行客》《专教学，先专语言》《但怀鲲鹏志，不与燕雀争》《常识、认识、共识、共事》《妄莫大于心躁，望莫大于新绝》等主题培训中，张继校长给老师们培训了新世纪教师工作与生活管理游戏规则，课程目标要求与课堂教学方法，以及怎样研究教学、提高效率，怎样服务学生、搭建“家校心桥”，怎样提升教学语言、提高课堂效率，怎样调整心态、融入团队等内容。要求各学科老师，以汉语“语言教学”为目的，以传播科学知识，传承优秀文化，教育学生养成良好习惯为目标，以服务学生、服务家长、服务学校、服务缅华社会为己任，精诚团结，恪尽本职，分工合作，共同

维护和提升新世纪新型华文教育品牌，做到无愧学生家长，无愧缅华社会。

在教学与导育管理的培训中，新世纪常务副校长张莖，负责教学管理的副校长罗仕荣，教学主任杨旭冬，导育主任钟黎辉等，为老师们培训了各学科课程目标要求和备课、上课、布置批改作业、培优辅差、开展教研活动等教学常规要求，以及怎样管理学生、注意安全、接送学生、服务家长、处理应急事件等管理规则。

在新教师培训总结的交流会上，所有新老师都做了发言。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对他们很有帮助，解决了他们心中的很多疑惑，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和不能做什么、学校“高压线”。全体新老师都表示愿意积极融入新世纪团队，与全体老师一道，为新世纪学生、家长、学校而尽职尽责，无愧中方教师形象，无愧家长学生和缅华社会。（来源：缅华网）

广西深化与东盟交通物流合作 助力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9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介绍，近年来，广西抢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的历史性机遇，高水平扩大开放合作，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牵引，深化与东盟交通物流合作，积极服务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今年1月—8月，广西与东盟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5%，广西与东盟的开放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跨境运输能力显著提升

9月16日，载着4200吨化肥的塞拉利昂籍船舶“金鸿达16”轮从防城港口岸渔漓港区1号泊位驶出，前往柬埔寨七星海国际港口，标志着“中国防城港—柬埔寨七星海国际港口”直航航线首航。

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是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广西统筹规划布局面向东盟的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全面推进快速网、干线网和基础网建设，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不断加速，并取得显著成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介绍，目前广西加速推进跨境铁路项目，湘桂铁路南宁至凭祥段提速运行，南宁至崇左铁路建成运营，防城港至东兴铁路将于2023年底建成，以凭祥铁路口岸为枢纽的跨境铁路运输通道加快形成。

广西跨境公路运输网络亦持续完善，以东兴、友谊关、水口、龙邦公路口岸为枢纽的高速公路通道全面建成。

同时，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已建成钦州港20万吨级航道、钦州港30万吨级油码头、全国首个海铁联运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等一批重大项目，江海联通工程——平陆运河进入全线动工建设阶段。广西北部湾港开通至东盟国家航线36条，实现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

此外，广西加快构建高效便捷的空中运输通道，南宁机场国际货运航线基本实现东盟国家全覆盖，东盟货运航线占航线总数的一半以上。

二、深化陆海双向开放 跨境物流高速增长

9月14日凌晨，装载着铁罐等货物的中越快速通关班列从广西

南宁国际铁路港出发，开往越南安员站。今年9月以来，中越边境的凭祥铁路口岸进出境货物共计1.2万吨，环比增长53.3%。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贸易往来增加，跨境货物运输品类也越来越多，经凭祥铁路口岸进出口的货物品类达620余种。

目前，南宁至河内的中越快速通关班列均实现南宁至凭祥线上运输时间4个小时以内，至越南同登最快5个小时，至越南安员最快14.5个小时，实现货物“当天开车、当天到达越南安员、当天完成清关提货”。

表里相合，此呼彼应。近年来，随着跨境物流运输规模的不断扩大，广西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整合港口、铁路、航空等资源，大力培育跨境物流运输体系，着力打造中国—东盟多式联运联盟，初步打造形成北部湾港海铁联运班列、中越跨境班列、中国—中南半岛跨境公路班车等多种物流组织模式，推动通道跨境物流规模持续高速增长，通道运行质量和水平显著提升。

今年1月—8月，北部湾港海铁联运班列开行量达6107列，班列线路已覆盖中西部17省(区、市)，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效应日益凸显。

跨境陆路运输规模持续扩大，广西相继建成通车5条跨境高速公路，在建2条抵边铁路，常态化开行广西至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的跨境公路班车和中越跨境班列，构建起以跨境公路运输为主、铁路运输为辅的公铁联运国际物流体系，有力拓展中国—东盟物流合作发展新空间。

三、智慧口岸加快建设 通关效率全国领先

“当前，越南和中国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我们接到的跨境货运订单量增长很快，期盼智慧口岸早日建成，为公司业务的开展提供保障。”越南 3D 开发投资股份公司董事长周氏芳容在接受采访时说。

9 月 15 日，中越友谊关—友谊智慧口岸项目在广西凭祥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中越首个跨境智慧口岸项目，双方将合作建设智能跨境货运专用通道，实现货物 24 小时全天候智能通关。到 2024 年建成投入运营后，友谊关—友谊口岸最大通关能力将翻番。

9 月 4 日—7 日，峒中公路口岸、龙邦公路口岸、友谊关公路口岸扩大开放先后通过国家验收。广西形成以友谊关、东兴、峒中、龙邦口岸为主通道，多个专业化通道相结合的跨境口岸枢纽体系，实现南宁至越南河内货物 24 小时运抵，至越南边境 4 省 12 小时运抵。

随着边境口岸快速发展，通关便利化水平加快提升，为加快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经贸合作提速升级 产业集聚持续增强

深化中国—东盟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是基础，产业发展是根本。近年来，广西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沿线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完善面向东盟的外商投资服务体系，加快打造高品质陆海联动经济走廊。

目前，以东盟为主要市场、以广西为基地的汽车、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等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初步形成。中(中国)马(马来西亚)“两国双园”、中泰(崇左)产业园等一批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合作园区正加快建设步伐。（来源：中新网）

◎国别研究

以东帝汶为例，中国该如何与小国打交道？

陈道彬

(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9月2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的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东帝汶友谊源远流长。中国最早承认东帝汶独立并同东帝汶建交。中方愿继续本着亲诚惠容理念，在现代化征程上和东帝汶携手同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夏纳纳说：“首先我想感谢能有这次宝贵机会来到这里出席第19届杭州亚运会。早在东帝汶处于战乱的艰难时刻，中国就一直在支持东帝汶，这对东帝汶尤为重要。我们把中国记在心里。”

本文对小国概念和小国外交的基本特征进行梳理，在小国视域下探讨东帝汶与中国关系发展特点与现状。从2002年与中国建交以来，东帝汶对中国外交以政治互信和双边务实外交为主要路径，在发展区域多边外交关系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或区域组织。东帝汶充分发挥中葡论坛作用、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各领域拓展与中国关系，通过构建互惠合作和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吸引中国对东帝汶投资与援助，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复苏。

东帝汶地处东南亚小巽他群岛(Lesser Sunda Islands)最东端，位于亚洲、大洋洲与太平洋、印度洋的交汇处，陆地部分与印度尼西亚西帝汶接壤，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东帝汶历史上曾是葡萄牙殖民地，公元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帝汶岛作为当时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转站，直到1975年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后，葡萄牙新政府让东帝汶人民投票实行民族自决。同年，印度尼西亚趁东帝汶政局混乱出兵，宣布其为该国第27个省(东帝汶省)。1999年，印度尼西亚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和严峻形势，同意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全民公投，最终东帝汶人民选择独立。2002年5月20日，联合国驻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正式将国家政权移交给新成立的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恢复独立的东帝汶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国家。目前，东帝汶总体局势平稳，但由于历史上长期的内乱与战争破坏，这个年轻的东南亚国家实力孱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一、小国概念的多视角和多维度

历来国际关系领域主要关注的是大国研究，对小国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少。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独立浪潮，这些脱离殖民统治的新生国家相继加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新兴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政局不稳、国家经济实力弱小，为避免美苏冷战带来的影响，亚非拉等国纷纷选择参与“不结盟运动”，至此，小国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大、中、小界定的变量和维度不尽相同，学术界对衡量国家大小(强弱)并没有统一标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小国是指地狭人少之国和小的国家。词典主要从地理面积和人口的角度定义，这也符合大部分人对国家大小的直观印象。

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小国的划分主要是以综合的视角来衡量，即参照国家不同变量、维度和衡量标准(如国家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变量和因素)来界定国家大、中、小的概念。国际上的常用标准是以人口来划分，人口不足千万的国家被视为小国，联合国小国论坛也是按照人口是否超过千万定义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小国。按此标准，根据联合国2019年发布的全球人口资料，小国约占全球国家数的60%。

美国学者罗斯坦从心理认知角度对小国进行界定认为，小国国家经济体量小、军事实力弱，对外部依赖和需要大国援助。这主要是基于建构主义的认知角度，一个国家究竟是小国还是大国，取决于自身以及外部对它的认知。韦民归纳了小国划分的普遍依据，即结合主观的心理维度和客观的物质维度，基于多角度、广视角来界定小国规模。例如，相对规模的小，即经济社会发展；绝对规模的小，即一个国家的领土或人口资源等客观维度；主观认识中的小，即地区或国际话语权低，依附他国发展。

贾兹贝对小国的定义更倾向于依据该国领土和人口数据，他把1万~1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规模和人口规模在150万~1500万之间的国家定位为小国。韦民也认为，在二战前后至今，人们对小国界定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是人口规模。孙西辉和金灿荣整理了国外学者对国家大小(强弱)划分的标准，依据主观和客观标准，包括人口和面积指标、实力维度及其所包含的经济和军事指标，虽然并无法律的、确切的定义，但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例如，将面积在25万平方千米以下、人口在1000万以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00亿美元以下的国家定义为小国。他们认为，在国际关系语境下，使用这种依托数据指标的综合划分法最为广泛。

可见，学术界对小国界定的维度和衡量标准并不一致，而且不同时期由于国家合并或分裂，也会造成国家大小概念的改变。再者，学者们对小国的定义主要基于某些维度的数据判断，有些国家在不同维度上则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丹麦和新加坡，虽然经济实力和人均GDP符合大国标准，但是在人口和面积上依然算作小国。作为21世纪产生的最年轻的国家，东帝汶国土面积为1.5万平方千米，人口规模为132万(2020年)，2020年GDP为19.2亿美

元，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落后，2018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47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基于领土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维度及人们的主观认识，东帝汶都符合小国标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东南亚小国。

二、小国外交特点概述

国际关系中的3个主要流派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现实主义(Realism)重视国家安全及国家实力，自由主义(Liberalism)看重国家间经济利益，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则强调国家的认同(National Identity)。这3个主要流派对小国外交关系特点有着不同的阐述。在现实主义视角下，小国的安全战略主要受到国际体系和区域性大国的影响，小国或弱国对区域事务较为敏感，会追随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受制于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将国际体系的关系分为体系决定型、体系影响型、体系作用型和体系无效型国家，认为小国是体系无效型国家，指出小国由于先天的不足，主要是依附于大国，自身不能够通过国家行为对体系施加影响。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则进一步拓宽了小国研究的视角，引入小国的国家观念和身份，认为小国也可以有自己的对外发展空间，应对地缘环境时会产生自己的对外策略。

由于小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外交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其应对大国和地区局势的能力也较弱，小国外交关系的路径选择也较为被动。相对于大国关注区域或国际影响力而言，小国更重视自身的国家主权、领土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发展与本国实力相适应的外交关系。但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国际秩序下，小国可以借助国际或区域组织发挥作用。特别是随着20世纪中期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亚非拉等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以小国为多数的这些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联合国确定的“一国一票”投票权和固定席位资格体系赋予小国在资源和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仍然有机会与大国平起平坐甚至讨价还价的权利和机会。

此外，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更多是把小国看作大国的追随者，认为小国外交的重点是如何积极利用大国优势与自身劣势进行互补以提升小国的外交效率，促进国家发展。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珍妮和其他学者分析了巴拉圭、卢森堡、约旦和老挝等一批小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总结出小国不会深度参与国际事务、外交关系局限为地域内、外交策略较多依靠多边机制或依附大国等特点。她将小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特征归结为，在小范围内解决外交问题，低层面参与国际事务，中立地位依靠大国，尽可能加入多边机制，等等。

除了有一些共性的外交策略，常见的小国外交策略还包括追随大国和参与各种国际或区

域组织，发挥小国在这些多边关系中应有的作用。国内学者更多探讨的是小国如何在大国或地缘政治背景下，利用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发展对外关系。

韦民认为，由于小国自身的脆弱性和依赖性，小国研究常常关注其灵活的外交优势和外交主动性特点，强调小国需要发挥先天特点和优势开展对外关系。例如，东南亚的新加坡在狭小的地理空间里创造出足够大的生存空间，自独立建国开始，其国父李光耀借鉴“不结盟”思想，奉行大国权力平衡外交路线，既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同时，李光耀数十次访华，也积极发展中新关系，尽量在与大国关系中不“选边站”，依附于大国发展。

三、东帝汶的小国特点

(一) 经济社会发展落后

受制于狭小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基础，东帝汶天生就具有小国的局限性。其陆地与印度尼西亚接壤，隔海与澳大利亚相望，介于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经历长期的战乱，国内经济基础受破坏严重，人民生产方式落后。2017年，东帝汶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为亚洲最贫困国家和全球20个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贫困率为30.3%，按照2011年标准，每人每日生活费少于1.9美元)。同时，东帝汶的小国经济有着脆弱的一面，2020年，东帝汶GDP为19.2亿美元，在202个统计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181位。此外，国家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经济以农业为主，基础设施落后，粮食不能自给，没有工业体系和制造业基础，依赖国外援助。国内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发的帝汶海油气资源，随着2020年石油价格波动，依靠资源收入的财政也受到不利影响。在全球COVID-19疫情蔓延的背景下，由于东帝汶2020年国家预算迟迟无法通过，政府公共支出锐减，东帝汶2020年GDP增长率为-6.8%。

(二) 国内政局渐趋平稳

历史上，东帝汶曾先后受葡萄牙、荷兰、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殖民或侵占，特别是在被印度尼西亚侵占的20多年间，其基础设施和行政司法体系等发展受到较大影响。在葡萄牙、澳大利亚等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努力下，独立后的东帝汶采取半总统共和制国家政体，采用国民议会制，政府部门由总理、各部部长和国务秘书组成，总理是政府首脑。国内政党林立，有着不同诉求和纲领，主要有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Revolutionary Front of Independent East Timor)、东帝汶全国重建大会党(National Congress of Timor Leste Reconstruction)和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等。恢复独立后，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作为第一大党组建首届政府，推进国家政局发展、民族和解和经济重建，但民生问题长期突出，民众不满情绪上升。早在1975年，东帝汶脱离葡萄牙获得独立之初，国内主要政党就

各自拥军，有着各自的建国诉求，彼此之间爆发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恢复独立后，东帝汶政府的施政和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2006年，东帝汶发生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骚乱，澳大利亚组建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协助维持治安，同年组建新政府。2012年7月，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被排除出组建的联合政府，首都帝力再次因新政府组建引发暴力冲突。目前，东帝汶局势趋于稳定，但国内政治僵局依然存在，国民议会在政策和预算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2018年，东帝汶总统卢奥洛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稳定的国内政局是东帝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 国际援助和优惠扶持

2010年，东帝汶政府颁布国家2011—2030年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制定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目标与规划，这对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东帝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东帝汶是亚太地区人均GDP最少的国家之一，严重依赖海外援助，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主要依靠咖啡、檀香木等原材料出口。国内农业发展落后，生产方式还是传统的刀耕火种，国内粮食生产不能自给，还需要面对自然灾害等因素，国际社会每年向东帝汶提供大量的粮食、物资等援助。在国外捐助方面，早在1999年年底，世界银行就首次举行东帝汶捐助国会议，讨论东帝汶财政预算和国家发展战略，并设立由联合国经管的基金作为对东帝汶捐助的渠道。根据东帝汶财政部建立的援助透明度网络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外国援助以提供资金和无偿援助方式为主，累计提供援助额约为27.7亿美元。该平台显示，主要援助方为澳大利亚、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美国国际援助署和欧盟等。根据2012年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方案，东帝汶被列为普惠制第一类国家，在产品关税方面被给予优惠。目前，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欧盟等对原产于东帝汶的绝大多数产品均实行免关税待遇。

四、东帝汶与中国关系特点

(一) 地区间的多边平衡外交，积极发展与中国关系

东帝汶的地缘特点决定了其对外关系绕不开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地区大国。东帝汶国土被印度尼西亚诸岛和澳大利亚环绕，在经济体量、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等方面都无法与这两个大国相比(详见表1)。独立以来，东帝汶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夹缝中谋生存和经济发展，与两国外交关系以寻求安全独立和经济援助为主，依靠发展与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为自身的经济与社会重建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

表 1 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国家概览

国家	人口 (2020 年, 人)	面积 (平方 千米)	GDP (2020 年, 美元)	人均 GDP (2020 年, 美元)
东帝汶	131 万	1.49 万	19.2 亿	1456
印度尼西亚	2.71 亿	191.3 万	1.06 万亿	3912
澳大利亚	2540 万	769.2 万	1.36 万亿	52158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Long 提出小国外交要善于利用其内生权力(intrinsic power),即特定的资源(例如石油天然气)和地理位置优势(例如位于重要海上通道)来发展与大国关系”。首先,东帝汶建国后,积极与澳大利亚发展友好关系,寻求澳大利亚提供的经济援助和重建资金贷款,帮助消除国内贫困,同时,共同解决帝汶海划界争议。2002 年独立后,东帝汶总统夏纳纳率团首先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寻求发展援助。2006 年 6 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对东帝汶进行访问,澳大利亚成为东帝汶最重要的海外援助国。东帝汶与澳大利亚毗邻的帝汶海油气储量丰富,独立后,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就帝汶海边界划分和油气开采收益分配等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双方通过协商签署《帝汶海协议》,由澳大利亚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开发帝汶海大东升(Greater Sunrise)油气资源。2018 年 3 月,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见证下,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新的《海上边界条约》,就帝汶海油气资源收益分配达成一致,这标志着两国第一次划定永久海洋边界。

其次,逐步修复与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寻求政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独立后,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首先面临历史恩怨和解和国内经济重建问题。经济上,东帝汶高度依赖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一直是东帝汶的主要外贸伙伴,东帝汶国内日常生活用品、食品等都需要从印度尼西亚购买。为改善两国关系,2006 年 2 月,东帝汶总理夏纳纳在巴厘岛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希洛会晤,两国历史恩怨和解取得了积极进展,随后,两国的陆地边界划分基本完成。目前,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已实现了双方人员往来互免签证。外交上,东帝汶积极寻求成为东盟正式成员国,这就需要印度尼西亚的支持。此外,在防务安全合作方面,东帝汶也需要加强与印度尼西亚的合作以维护边界和国内政局稳定。

东帝汶与中国关系源远流长,早在 14 世纪,就有中国人来东帝汶进行檀香木贸易,近

代“下南洋”时期，两地之间也有频繁的人员往来。历史上，东帝汶和中国澳门同为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东帝汶的总督曾由澳门总督兼任，澳门是中国人与东帝汶交往的桥梁。近现代，中国政府对东帝汶人民在争取国家独立中给予支持，1999年成立联合国驻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时，中国第一次向海外派遣民事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000年9月，中国在帝力设立大使级代表处，2002年，成为第一个承认东帝汶独立的国家。两国建交后，东帝汶与中国双边关系发展良好，政治层面建立互信，经贸人员往来密切，中国为东帝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人员培训，同时，东帝汶在核心利益上均给予中方坚定的支持。东帝汶与中国的双边外交体现了中国外交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注重建设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

综上所述，东帝汶在与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来平衡地区大国影响。从平衡外交的要素看，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通常包括一个小国和两个以上的大国，此类外交着眼于小国的立场和视角，实施国是小国或弱国，实施对象是两个以上的大国或超级大国。国力较弱的国家为保证安全，在国际政治的外交战略上会选择追随(bandwagoning)的外交政策。东帝汶在处理邻国及中国的多边外交关系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小国外交共性。一是东帝汶的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其不能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选边站队”，而是采取均衡发展以获取安全的外部发展环境和经济援助；二是积极发展与域外大国——中国的关系，多方平衡，开展灵活外交。

(二)推动政治互信和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行务实友好的对华外交政策

按照 Long 提出的小国权力划分，小国的外交政策成因之一是借助大国的力量发展自身经济，他把这一外交行为称为衍生权力(derivativepower)。摩根索认为，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的生存，它包括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内和平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宁等方面。小国的外交策略离不开与域外大国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因为小国自身实力较弱，外部支持是提高它们外交策略有效性的有利条件。东帝汶的独立过程得益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及葡萄牙、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不同于大国间的平衡或均势战略，独立后的东帝汶意识到与世界各国发展多边友好外交的重要性，为弥补自身发展条件的“先天不足”，通过多边外交广泛寻求国际援助，迄今已同 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对华外交关系上，东帝汶与中国双边高层往来频繁，东帝汶总统、总理等政府首脑曾多次访华，中国也多次派出副部级以上官员访问东帝汶。纵向来看，不论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如何变化，在不同领导人执政时期，东帝汶与中国始终保持务实友好与政治互信，在各领域开展交流合作。2002年，东帝汶独立当日即与中国政府建交，签署了东帝汶恢复独立后

与外国政府的第一份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也分别致信祝贺，这标志着东帝汶与中国开启了外交关系新篇章。2003年9月，东帝汶总理阿尔卡蒂里率团访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与东帝汶代表团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达成共识。在政治层面上，双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高层交往频繁；经济层面上，双边经贸合作不断发展，开展互利合作，中国对东帝汶基础援建项目得到落实；国际上，两国相互支持配合，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

2014年4月，东帝汶总理夏纳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睦邻友好、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并签署多项协议、备忘录和意向书。

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深化发展，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领域合作，不断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实现了建交以来不同时期领导人的高层会晤成果和两国政府务实的双边外交政策。2019年，中国与东帝汶进出口额均呈现显著增长(详见表2)。东帝汶与中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具有覆盖面广和合作广泛的特点，包含政治、经贸、能源、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和防务安全等各个领域。

表 2 2019 年中国与东帝汶进出口额数据一览表
(单位:千美元)

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1~12月	1~12月	1~12月
167510	142946	24564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

(三)参与国际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发展经济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国际背景下，东帝汶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组织机构，以此提高国际参与度和话语权，提升国际形象，改善外部发展环境。Long 认为小国外交政策的成因是，小国通过集体权力(collective power)加入国际制度、地区组织以调节国家间关系。Jeanne 也将小国外交行为特征归纳为强调国际法和基本准则，尽可能地加入多边机制，低层面参与世界事务，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解决外交问题。比如，为尽快获得东盟的正

式成员身份，东帝汶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其决定采取的首个步骤就是努力成为东盟地区论坛成员。此外，据世界贸易组织网站消息，东帝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已于2020年10月1日举行，这标志着东帝汶正式启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截至目前，东帝汶除了加入联合国和联合国相关组织机构，还是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ACP)，国际金融公司(IFC)，美国促进海外投资组织(OPIC)，脆弱国家联盟(G7+)，南太平洋旅游组织(South Pacific Tourism Organization)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大约有20个国际组织在帝力设立了办事处，为东帝汶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各类平台。

在借助国际组织发展与中国双边关系来看，东帝汶首先是通过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简称“中葡论坛”)来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葡萄牙语为东帝汶官方语言之一，早在2002年8月，东帝汶便以葡语国家身份加入葡语国家共同体。葡语国家共同体是全球8个葡语国家间基于历史和文化纽带，加强跨区域合作的一个国际组织。2003年10月，中葡论坛在中国澳门创立，其平台作用开始发挥。中葡论坛是一个以经贸促进与发展为主题的非政治性政府间多边经贸合作机制，旨在发挥中国澳门联系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平台作用，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东帝汶以此为经贸、人文合作交流平台，以中国澳门为桥梁积极拓展平台优势发展对华经贸，推介东帝汶国内资源吸引中国企业投资。2013年6月，作为葡语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国，东帝汶举办了中葡论坛10周年年会，这为东帝汶提供了国际交流平台。2016年10月，东帝汶国务部部长赴中国澳门出席中葡论坛第5届部长级会议，进一步发挥了中葡论坛在中国与东帝汶经贸关系中的推动作用。2020年，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为帮助葡语国家共同抗击疫情，中葡论坛进一步致力于发挥中国澳门的平台作用，中国政府联合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澳门葡语系国家区域酒类及食品联合商会等机构向东帝汶捐赠防护物资，充分发挥了平台的作用与价值。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合作在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方面成绩斐然，这显示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信任，也彰显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吸引力。东帝汶利用其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两大洋的地缘优势，驳斥了所谓的“中资威胁论”，以积极姿态融入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小国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更加依赖一个国际组织体系，渴望寻求合作发展，作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国家，在各个领域的经济投资中，东帝汶大力与中国开展合作。最著名的有中国参与的“一网”“一路”“一港”项目建设，即东帝汶国家电网、苏艾高速公路和蒂坝港项目。这些项目是中国与东帝汶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建成后，蒂坝港将与苏艾高速

公路一起，支撑起东帝汶的油气开发计划。随着 2017 年东帝汶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成为其中一员，“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帝汶落地。同年，东帝汶政府由夏纳纳率领代表团参加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东帝汶通过积极参与中葡论坛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合作投资项目和资金，积极推动大型项目开发，提高了本国基础设施水平。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东帝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劳务合作伙伴。

同时，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帝汶与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人文科技交流合作得以深化。中国为东帝汶提供了农业技术培训，开展医疗援助，免费提供留学人员赴中国学习的机会，加强安全警务及生态环保等各领域合作，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2019 年，中国湖南省与东帝汶马纳图托区签署省级国际友好城市协议，东帝汶帝力市也与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深圳市商签缔结友好城市协议。到东帝汶投资的中国企业日益增多，涉足基础设施、农业和贸易等多个领域，目前，在东帝汶从事承包工程的中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约有 20 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东帝汶经济社会重建的需要，也推动中国与东帝汶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结 语

东帝汶的小国外交受自身实力和地区大国的影响，在对外关系中往往寻求与大国合作，寻求在大国博弈中获得发展机遇，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此外，东帝汶的小国外交具有依赖性特点，除了开展多边合作保障主权安全，也积极寻求国际投资和经济援助，改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局面。所以，东帝汶在与大国的多边外交中没有采取选边(sides-taking)或骑墙(fence-straddling)策略。东帝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体现了当今小国与大国外交的典范，体现出中国在构建国际政治新格局中发挥的作用，也折射出中国特色新型大国外交的特点，即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把经贸关系作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动力，增强相互认同，实现平等互惠与合作共赢。最后，中国与东帝汶双边睦邻友好关系是建立在政治互信、互惠互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的，东帝汶依托与中国现有的区域合作平台——中葡论坛及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未来两国的双边关系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与发展空间。

（本文来源：《东南亚纵横》2021 年第 3 期）

对越南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

罗文英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摘要:越南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经历多年的课程改革调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体系。其课程改革的主要特点,一是紧密结合越南革新开放的实际需要;二是突出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地位;三是摆脱“苏联模式”的长期束缚强调民族特色;四是注重教育教学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研究越南高校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改革的探索历程,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遇到的问题值得思考。

关键词:越南高校;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改革

越南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教育,越南建立民主共和国后按照苏联的教育体系建立了本国高校政治理论课程,并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形成了独具越南特色的高校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准确界定越南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概念及范畴,深入研究越南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改革历程及其特点,对于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规律,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越南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概念界定

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的普遍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长期以来,我们曾经错误地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其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即使在美国,虽然没有使用思想政治教育之类的概念,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在美国社会中受到了高度重视,而且形成了其鲜明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1]但是,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之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和应用却大相径庭,在基本概念和具体内涵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更加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强烈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并公开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治党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以及相应的形式和内容也是不同的。

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具体的现实形式。目前我国国内对于越南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

些学者称其为“马克思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另一些学者则称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教育”。还有更多的学者用中国的概念去套用，也称其为“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此同时，对越南高校开设的这类课程的表述，也显得五花八门，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马克思列宁主义课”“思想政治教育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等。一些越南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或向中国介绍越南的这类现象时，为了便于中国学者理解，也将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概念用于越南的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介绍，如在湖南大学留学的越南学者范诚忠的博士论文，就题为《越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研究》，这些都使我们的一些研究者以为这就是越南的概念。

关于越南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主观猜测，必须回到越南官方的权威性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答案。在1995年5月3日越南共产党中央办公厅颁布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提高大专院校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各门课程质量和效果预案的第214-TB/TW号通知》中明确指出：“对在国内外学习的所有大学生，政府要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课程为必修课”。这里使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课程。”但在2008年9月，越南教育与培训部颁布的《关于颁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专业高等教育政治理论课程大纲的决定》中指出：本决定颁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专业高等教育政治理论课程大纲，大纲包括以下课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胡志明思想”“越南共产党革命路线”。在这个决定中明确使用“政治理论课程”概念。在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于2015年3月出版的《胡志明思想教程》的“引言”中，特别说明该教材是由教育培训部组织专家编写，“用于非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专业的大学生的政治理论教材系列”，“对大学生——国家的年轻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理论教育、对培养人才以及胜利进行国家革新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治理论教育”和“政治理论教材”，这两个概念清楚地出现在教材的出版说明中。由此可见，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越南被称为之为“政治理论教育”。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越南被称之为“政治理论课”。研究越南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当然要使用越南官方的概念和定义，而不能越俎代庖，简单地套用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概念。事实上，一些越南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对此有准确的表达，但没有引起我们学者的足够重视。如越南学者丁春理的《越南高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现状与革新的方向》一文，使用的就是越南官方的“政治理论课”概念。^[2]

越南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概念定位自有其现实考量。既然越南定位于政治理论教育的概念，其范畴与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范畴也就不会完全相同。以政治理论教育和政治理论课定

义为前提，越南的政治理论课程的设置主要有三门，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胡志明思想”和“越南共产党革命路线”。从课程内容看，越南的政治理论课程侧重于政治教育、理论教育，而且也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课程”，突出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教育，故称其为“政治理论教育”和“政治理论课”倒也名符其实。比较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的内涵则要宽泛得多，实际上是思想、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道德和文化等教育内容的复合体。对我国来说，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已扩大到民主与法治、市场经济、传统文化、思想道德、青春期发育、心理健康、生命意识、生态观念、生活和职业指导、宗教知识等较为广阔的领域，因此，我国高校的思想教育任务需要由五门课程共同完成，并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名符其实的。

二、越南高校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及其改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按苏联模式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斯大林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但是苏联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必读书，而且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向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推荐。各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等院校都开设大体相同的政治课程，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布)党史》或《××共产党历史》。越南在1945年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后，越南共产党也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越南共产党历史》等四门课程，一直坚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唤醒了越南共产党的忧患意识，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加强和改进马列主义教育的重要性。随着革新开放的推进，在越南共产党把胡志明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确定为指导思想后，越南共产党明确要求，必须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风尚教育，全面推进大专院校的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的教育。大专院校的政治理论教育，由越南教育培训部统一制定方案并组织实施和管理，从开设专门课程、统一编写教材，到确定教学内容、明确学分学时，全都在教育培训部的领导下进行。政治理论课的教材也只有指定的出版社才能出版。越南高校的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工作是在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的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的。根据越南学者陈冰清的介绍，“革新开放前(1986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设有：马列哲学；马列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越南共产党历史等四门学科。”

^[3]此后，《胡志明思想》从《越南共产党历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大学课程。从1991年到1999年，越南国家教材编写委员会根据教育培训部的课程大纲，分别组织编写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越南共产党历史》和《胡志明思想》等五门教材，形成了完整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

根据革新开放事业的发展 and 新的形势变化，越南教育培训部也不断对政治理论教育体系进行调整。2002年，教育培训部出台关于提高高等院校马列主义教育质量若干办法的494号决定，即越南高校政治理论课的“02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和名称没有变化，仍然是五门。一年级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二年级开设“科学社会主义”，三年级开设“越南共产党历史”，四年级开设“胡志明思想”。2003年，已经独立设置的“胡志明思想”学科成为越南高等院校的必修课。

2008年，越南教育培训部根据越共中央宣教部和中央理论委员会的意见，颁布《关于颁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专业高等教育政治理论课程大纲的决定》。在这个“08”方案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把原有的五门政治理论课调整为三门，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胡志明思想”和“越南共产党革命路线”，“适用对象为2008—2009学年及之后录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专业高等院校学生。”^[4]“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105课时，在第一学年开设；“胡志明思想”45课时，在第三学期开设；“越南共产党革命路线”60课时，在第四学期开设。这样，越南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的总课时变为210课时（10个学分），约占高校培养课程的7%。^[5]这一方案一直沿用至今。

三、越南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的主要特点

综合考察越南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改革历程，深入分析其课程设置、教材体系及教学内容变化，可以看出越南高校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改革的特点。

1. 紧密结合越南革新开放的实际需要

越南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改革是与越南的革新开放同步进行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越南革新开放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在课程改革方面，20世纪90年代从“苏联模式”改为五门课程，是为了适应苏联解体后新的国际形势和越南国内革新开放路线调整的要求。特别是在此期间，将“胡志明思想”从“越南共产党历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设置的课程，并进一步成为所有大学生的必修课程，这是越南高校政治理论教育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的现实基础是：越共七大后，越南共产党将胡志明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和宪法，胡志明思想作为越南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越南革新开放的思想先导、理论指南和政治保障，其重要地位在全党和全社会达成了高度的理论共识和政治共识。这一改革在实施中充分体现了它的重要性，对于加强胡志明思想教育，解决越

南革新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2002年、2004年、2008年的几次较大的课程改革和调整，都是基于革新开放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的。

2. 突出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地位

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特征。但不同国家在思想重视程度、具体实施方法以及实际教育效果等方面有所区别。越南将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于政治理论教育，并将范畴界定为“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教育。”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内容和课程等相比，越南的政治理论教育虽然也包含法律、道德、伦理、历史观等思想教育的内容，但核心和重点在于理想信念教育。这是越南政治理论教育的突出特点。

越南之所以如此重视和强调理想信念教育，是由越南所处的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所决定的。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严重的理想信念危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着沉重的意识形态压力。越南作为与苏联关系紧密的“以苏为师”的国家，其面临的危机和压力更为紧迫。越南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全党达成了“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僵化模式的危机”的共识，要把这一党内共识变成社会共识，就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随着越南革新开放不断推进，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的压力不断加大，生活方式多样化和价值观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这些对人们的理想信念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这也对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越南共产党一直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其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核心内容，给予高度重视。特别是经过几轮课程改革调整之后，其理想信念教育更加聚焦于帮助学生形成对越南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3. 摆脱“苏联模式”的长期束缚强调民族特色

如果说在苏联解体之前，越南的政治理论教育较多地照搬“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苏联解体之后，经过几轮改革，越南高校的政治理论教育则更加突出民族性，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上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越南共产党革命路线》的教学内容是越南人民在胡志明思想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选择与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教程》的教学内容中“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越南共产党从越南国情出发，根据马列主义，对越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道路作出的选择和探索。《胡志明思想教程》教学内容中胡志明的“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思想、“建设由共产党领导的民有民治民享法权国家”的思想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的思想等，都是越南共产党对相关问题的独特见解和认知，具有鲜明的越南民族特色。

4. 注重教育教学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

苏东剧变以后，在革新开放中，越南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政治理论教育体系进行反思，开始探索新形势下的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教育，并努力保持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教育的科学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体系。特别是在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建设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效。三门政治理论课程既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相互依托，相辅相成，构成了完整的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教育体系。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教程》是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教育，《越南共产党革命路线》是党史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那么《胡志明思想教程》就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教育。三门课程的教材编写都着眼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目标，既注意时代和社会的变革，紧跟越南共产党中央的思想和精神，又密切跟踪青年学生的思想变化和精神需求，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向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的较好转化。此外，三门课程教学的循序展开既体现理论的全面性系统性，遵循理论的先后逻辑关系，也符合大学生的认知规律。

四、几点思考

尽管越南高校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经验，但其改革紧密结合越南革新开放的实际，具有鲜明的越南民族特色，其改革的一些经验也反过来值得我们借鉴，其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研究。综观越南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有几个共性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第一，政治理论教育概念范畴的界定，既要据实定名周延准确，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实质。如何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关系到在实际工作中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如何把握等重要问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涉及大学生成长的方方面面，内容是比较宽泛的，而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和课时数量是有限的，要解决好这个矛盾，需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越南将政治理论课严格界定在政治理论教育的范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样有利于更加突出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性、理论性、意识形态性，更加聚焦于理想信念教育这个主题，特别是聚焦于培养学生对越南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相比较而言，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承载过于宽泛的内容，必然会冲淡其理想信念教育的主题。我国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界定比较宽，在实践中还存在不断扩展、逐步泛化的趋势，一些学校把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甚至青年学生的婚恋教育、择业教育等都纳入思想政治课的内容；有的老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而将教学内容变成文史通识教育，甚至变成

心灵鸡汤，降低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政治性和理论性。因此，在“三全育人”的大框架下，各方面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好思政课的边界，防止“跑题”“变调”，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二，政治理论课课程的设置，既要根据实际需要，也要注意尊重学科的学理性和体系性要求。越南将过去开设的4门课、5门课合并调整为3门课，目前开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胡志明思想”和“越南共产党革命路线”三门课程，覆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及在越南的运用和发展，是符合越南实际的。三门课程既相互衔接，又各有侧重，避免交叉重叠。特别是将“胡志明思想”作为一门独立设置的课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样可以更好地体现胡志明思想的理论性和体系性。相比较而言，过去把胡志明思想融入“越南共产党党史”之中的做法，虽然可以“史论结合”地介绍胡志明思想，但“党史”以历史为主线的课程体系难以体现胡志明思想的理论性和体系性。

第三，课程教学的时序安排，既要遵循科学理论本身的先后逻辑关系，也要遵循学生的学习认知规律。越南安排三门政治理论课的时间顺序是：一年级开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胡志明思想”，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越南共产党革命路线”。这样的时序安排，让学生先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而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胡志明思想，从而为学生学习研究越南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奠定理论基础。这样的时序安排较好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符合从普遍理论到具体实践的逻辑，也符合大学生的认知规律。当然，越南并没有完全解决好时序问题，但其做法可以启示我们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教学内容的时序安排不仅仅是一个具体教学工作安排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教育的实际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的要求，这里的“序”不仅包括大中小各学段之间的先后衔接，也包括大学阶段各门课程的先后时序；不仅包括理论体系本身的先后逻辑关系，也包括学生学习认知的规律。因此，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不仅要注意各学段的衔接，而且也要重视各门课程的时序衔接。

第四，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定，既要有严格的规范性，又要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教学大纲和教材是课程的基本规范，要有刚性。但大纲和教材有相对稳定的特点，而实践和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新的实践和理论成果需要随时进入思政课的教学内容，这就要求大纲和教材要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刚性、规范性与开放性、灵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考察越南高校政治理论课的大纲和教材，感到其开放性和灵活性略嫌不足。《胡志明思想教程》更多的还是局限于介绍胡志明著作、讲话中的思想，而对胡志明逝世后越南共产党在实

践探索中，特别是革新开放中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反映不够。革新开放以来，越南运用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解决越南革新开放实际问题，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对胡志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完全可以纳入胡志明思想体系之中，但是，在《胡志明思想教程》中这些理论成果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此外，越南近年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不再强调“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 these 问题是越南革新开放的重大问题，在党内外、国内外都引起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青年学生对这些问题也存在许多困惑，但无论是《胡志明思想教程》还是《越南共产党革命路线教程》都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更没有运用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对这些问题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与回答。越南教材中的这些问题值得引以为诫。

越南高校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改革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地向前推进，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越南的经验，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越两党应该“互学互鉴治党理政经验”的实际行动，这对于开拓国际视野，从世界范围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无疑是有意义的。（**本文来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1, 37(04)**）

◎热点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改变了东盟的什么？

罗圣荣, 杨梓琰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助理)

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随着全球权力中心逐步东移，亚太区域的战略意义日臻凸显。2010年，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成为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2013年，在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现的百年变局之际，中国向国际社会正式推出“一带一路”这个富有历史使命感的国际公共产品。其中，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首创之地。在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努力下，历经十年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生机勃勃，东盟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受益者。“一带一路”倡议的首个十年，亦是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黄金十年”。东盟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向3.0版迈进，也实现了谈判多年的RCEP落地生效，更是推动了东盟成员国内部的“五通”，东盟共同体建设在十年间得到飞速发展。本文从“一带一路”倡议视角出发，探讨东盟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十年，是如何成为东盟共同体建设华丽转型的“黄金十年”。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

(一) 设施联通助推东盟夯实经济共同体的物资基础

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通畅是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物质保障，区域经济共同体形成需要实现国家间互联互通。自2006年《曼谷宣言》签署至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之前，经济发展不平衡，低工业化水平下基础设施薄弱严重滞迟东盟经济共同体建立进程，以老挝为代表的东盟发展中国家难以接洽经济一体化。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2013年老挝铁路里程仅为3.5公里，其交通基础设施竞争力分值仅为54分，居世界第136位。俗语道“要致富、先修路”，“一带一路”下“设施相通”是实现东盟互联互通的优先方向，交通设施建设更是“设施相通”的关键着力点。在陆上，中国与中南半岛的铁路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一大批项目稳步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铁路联盟正式成立。通车于2021年的中老铁路，是老挝第一条规范化国际铁路，将老挝铁路里程提升至400公里以上，极大优化了老挝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连通性。同年，老挝交通

基础设施竞争力分值提升至 64 分，排名提升至 96 名。在空中，中国和东盟各国民航部门持续推进民航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方互联互通水平。中国通航的东盟城市从 6 个增长至 44 个，航线数量从 10 条增长至 671 条。在海上，随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面推进，中国与多个沿线国开展战略对接，海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获得巨大成就。缅甸皎漂港、马来西亚马六甲临海工业园区、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建设工程等多个项目扎实落地。在信息化建设领域，截至 2023 年 5 月，“一带一路”倡议累计推动中国-东盟建成 34 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助力“空间信息走廊”建设，并数字化升级改造港口、铁路、道路、能源、水利等传统基建，“中国—东盟信息港”基本建成。随着“陆、海、天、网”四位一体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东南亚区域互联互通水平明显提高，成功实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基础设施 2025》战略的“软硬”对接，东盟经济共同体发展的“硬件”短板得到极大改善。

（二）资金流通与贸易畅通提升东盟共同体区域经济地位

2013 年，东盟各国经济总量仅为 2.5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 3.2%。而到 2023 年 10 月，综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东盟经济共同体经济总量已接近 4 万亿美元，是亚洲第三、世界第五的经济实体。随着东盟经济飞速发展，东盟已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任何国家都或不可缺的合作伙伴。东盟经济地位提升与“一带一路”倡议下“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紧密相关，资金融通和贸易互通促进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经济互联互通 2025》战略“软对接”。首先，“资金融通”进一步助推东南亚金融市场全方位建成、高水平开放。资金融通深化东盟各国金融联通，稳定亚太地区货币体系，推动东盟国家信用体系规范化建设。其次，“资金融通”积极推进多边合作下的区域金融开放机制，解决前“一带一路”时代东盟国家融资难、融资少的困境。再者，随着亚洲基础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经济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个融资组织的不断建设，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信用评级不高的国家融资能力显著提升，仅 2023 年东盟便吸引外资超过 210 亿美元，环比增长 60%以上。在实现“资金融通”的目标后，“贸易畅通”旨在消除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向东南亚区域提供高质量营商环境，释放各国贸易潜力和活力。经济霸权国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创造贸易壁垒是制约东盟经济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自 2016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强调“美国第一”，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减少国际公共产品供应。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及时弥补国际公共产品的不足，为区域贸易的畅通搭建平台。中国与东盟一道成为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

地生效的主力。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后，这个自由贸易区涵盖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总量，标志着东盟经济共同体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引领地位。据世界银行统计，RCEP已超越北美自贸区 and 欧盟自贸区，其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比重21%以上，是全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

（一）助推东盟由经济共同体向政治安全共同体迈进

安全共同体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客观产物，共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需求、经济目标及相似的经济制度，对于安全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东盟内部层面，经济共同体良性发展需要“共同安全”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以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随着东盟经济一体化深化和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东盟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区域分工趋势不断增强。一旦东盟某个成员国陷入“政局动荡”，整个东盟经济系统都将受到牵连。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起到了防范风险、维护经济共同体平稳运行的关键作用。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互为因果，相互作用。而在国际环境外部层面，政治共同体有利于合力抗击区域外大国经济霸权主义政策。东盟向来强调独立自主的中立主义，强调东盟组织的独立性，并希望将经济共同体的职能拓展。通过抱团取暖、自成一极来保障自身安全自主性和安全选择多样性，并以此维护其经济稳定繁荣发展。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立建成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事实上，中国在2022年博鳌论坛年会上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安全观的理论升华，两大倡议下的中国新安全观与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理念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逻辑。“发展”是中国与东盟的“最大公约数”，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区域经济繁荣稳定是双方共识。中国与东盟更加注重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抗击疫情、国际河流治理等，摒弃了所谓“集体安全观”的结盟路径，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强调合作安全 and 多边主义，同时将共同发展融入到合作安全中。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推动下，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于2015年建成1.0版本，并于2022年升级到2.0版本，不断强化政治安全共同体各领域职能。

（二）“一带一路”推动东盟引领地区安全架构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政策相通”助推东盟制度化和体系化。东盟制度化和体系化可以分为内外两个维度。在内部体系构建维度，东盟内部的制度化和体系化成就显著。首先就多边协议和框架设计层面，东盟以“东盟方式”和“政策相通”精神，进一步强化安全交流，将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制度化，通过《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2025）》并建立多个高层

安全对话机制。如东盟国防部长会议（ADMM），起到了斡旋冲突、协调一致的重要作用。其次就东盟成员国团结性和政策整体性而言，东盟各成员国将其它成员国的安全问题统筹一致，提倡在东盟框架内解决国别安全问题。2015年东盟峰会宣布政治安全共同体建成之后，历届峰会皆将“缅甸问题”视为共同问题，倡导在东盟内部以对话、交流的形式促进地区稳定和民族和解，反对外部势力介入缅甸，尤其反对西方霸权国家对缅甸制裁。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内部制度化和强化推动东盟整体实力和权力显著提升，安全自主和多样选择之路愈发踏实，最终通过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形成以东盟为中心地位的亚太区域安全架构体系。在外部体系构建维度，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发展战略对接的十年，亚太区域主要大国在东盟引领安全架构基础上不断强化与东盟关系。例如，日本和韩国在原有的（10+3）框架下分别以（10+1）的方式深化与东盟共同体安全合作；2022年5月，美国正式宣布与东盟建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印度也试图通过印太版的“东进战略”，在东盟主导的亚太区域体系中获得更多话语权。由此，以东盟为核心、中日韩为第二层面、美印为第三层面的亚太同心圆式安全架构基本形成。回首十年，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地位提升离不开“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战略支持。一方面，中国-东盟“政策相通”涵义深远，是中国政府理解、尊重东南亚国家外交自主、主权独立的政策体现，中国积极推动东盟引领地区安全架构。另一方面，“政策相通”推动中国与东盟、东盟国家政治互信，实现有效政策沟通，并初步构建起以东盟为核心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

（一）“民心相通”推动塑造“东盟价值观”与强化“东盟认同”

东盟经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建成，所配套的“硬件”为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软件”赋能。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发挥了强化东盟各成员国团结一致、构建并深化地区认同的“软实力”作用。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首先，文化认同是地区国家间合作的基础。其次，地区文化认同理解离不开国家团结下的集体共同价值观的塑造。再者，文化认同和共同价值观推进区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规范化和组织化。最后，通过政府和民间的互动交往，产生“区域社会”这一概念，并经由共同教育和社会文化交流实现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内部平衡和外部拓展。在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民心相通”推动东盟国家各国团结包容，塑造文化认同和共同价值观，深化区共同体区域规范化和组织化，最终形成“东盟社会”，并通过教育和体育交流实现内部协调和外部拓展。一方面，随着“民心相通”下的“自发性地区化”推进，东盟根植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区域文化认同逐步复苏、觉醒。另一方面，新

时代中国“亲、诚、惠、容”理念和东盟“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塑造了以“发展”为最大公约数的东盟价值观。此外，东盟通过多边协议，共同设计规范化发展，即《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 2025》。而“民心相通”也推动了东盟国家人文交往，以“东盟运动会”、“一带一路运动会”为代表的大型体育赛事日渐频繁，在东盟国家、东盟国家民众和中国人民中反应热烈，通过互动产生并强化了“东盟社会”和“东盟公民”的观念。“民心相通”立足实际，强化教育合作，平衡协调内部差异，拓展共同体外沿。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十年间，中国不断援助东盟国家扫盲，提高东盟总体识字率，东盟人均识字率由 2013 年的 89.6% 提升至 2023 年的 95.2%。

（二）东盟由“文明冲突”向“文明互鉴”包容性转变

长期以来，东南亚区域因历史、殖民、语言、信仰而存在着广泛的“文明冲突”。除却泰国，东盟其它国家大多曾是英国、法国、美国的殖民地，使半岛国家和群岛国家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观念不尽相同。多元文化导致的冲突一度此起彼伏，边境冲突、分离主义、军事政变问题层出不穷。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与东盟价值观产生共鸣，具体而言，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 2025》中，提倡各国团结合作、强化东盟各国共同体认同、强调公平正义、包容和保护弱势、边缘群体以及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东南亚区域逐渐由“文明冲突”转向包容性的“文明互鉴”。总体来看，自“一带一路”倡议施行以来，东盟各国政局渐趋稳定，曾经的“东方巴尔干”逐渐变化为“东方欧罗巴”，东南亚的军事政变、国家间武装冲突越来越罕见。政变频出的泰国自 2014 年之后政局逐步平稳，纵使王位交替和大选也未引发大的政治风波。缅甸政局虽仍有波澜，但和解的趋势不可避免。中国-东盟国家历史上的友善交往是摆脱“文明冲突”的精神本源。历史地看，东盟的传统文化与“汉字文明圈”和“佛教文化圈”密切相关。抚今追昔，不仅古代中国就与东南亚国家缔结下深厚友谊，且在新中国成立、东南亚各国陆续独立之后，中国以历史传统为基础，与东南亚各国树立了如“中缅胞波”、“中泰一家亲”、“中柬铁杆”的国家情谊。在文明传承的基础上，“民心相通”也注重文明创新。发展地看，中国与东盟通过认识文明多样性、理解文明独特性、发掘文明的美好性，协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赓续中国与东盟国家传统友谊。原本分裂，甚至冲突频仍的东南亚国家正往融合裂痕、平等互鉴的方向迈进。“美美与共，平等包容”既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精神，也是“东盟价值观”的内在涵义。

结 语

“一带一路”倡议的黄金十年，东盟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成就斐然，惠及东盟各国以及中国大部分人群。政策相通实现了高层次高水平的战略互信，设施联通促进了东南亚区域的互联互通。资金融通弥补了东盟区域内部分国家融资补偿的短板。贸易畅通旨在消除贸易壁垒，为 RCEP 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国际营商环境。民心相通则为文化交流，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实力支持。而中国分别于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中不断升华和深化的过程。换言之，只有立足长远，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才能继续创造出下一个“黄金十年”。（**本文来源：东南亚学人**）